



評述戰略文化與國家戰略的關係：兼論中國的戰略文化

REVIEW ON STRATEGIC CULTURE'S INTERCONNECTIONS WITH NATIONAL FOREIGN STRATEGIES: CASE OF CHINA'S STRATEGIC CULTURE

陳鏜

CHEN KAI

廈門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國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iamen University, China

E-mail: kaichen@xmu.edu.cn

Received: 15 April 2020 / Revised: 29 April 2020 / Accepted: 20 May 2020

摘要

論文評述了中外學者對戰略文化（尤其是中國的戰略文化）的研究，及其在戰略文化研究上的交集與分歧。接下來，論文探究了戰略文化與國家戰略的主要關聯，並探討了戰略文化適應戰略形勢變化的不同方式。

關鍵詞： 戰略文化，國家戰略，地緣環境，決策者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studies of strategic culture in both home and abroad, while analyz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scholars,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China's strategic culture. The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stresses how strategic culture adapts to the changing situations of strategies.

Keywords: Strategic Culture, National Strategy,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Decision Maker

緒論

「戰略文化」是指特定地緣環境中，國家在實現其利益時，體現出的相對持久、穩定的戰略理念。透過戰略文化視角分析國家戰略，有助於更為客觀地評價一國的戰略，還能避免誤讀或誤判一國的戰略。本文評述了中外學者對戰略文化的研究，並以中國的戰略文化為例，分析了中外學者在戰略文化研究上的交集與分歧。接下來，本文探究了戰略文化與國家戰略的主要關聯，並探討了戰略文化適應戰略形勢變化的不同方式。

一、 戰略文化研究的沿革

冷戰期間，部分西方學者意識到，國際環境的複雜性與決策者認知的有限性，導致決策者難以避免戰略決策的錯誤。因此，他們嘗試從新的視角研究國家戰略，即將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聯繫起來，突出國內政治、社會因素對國家戰略的影響。比如，傑克·斯奈德（Jack L. Snyder）於1977年提出了「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的學術概念，將其定義為「一個國家戰略主導集團對於核戰略指令或類比所共有的整體概念、制約性情感反應和習慣行為模式的綜合。」（Snyder, 1977:8）傑克·斯奈德認為，美國和蘇聯在冷戰中的戰略決策均受到本國文化價值的深遠影響，從而形成兩國在戰略選擇上的明顯不同。

1990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率先舉辦了一個探討戰略文化研究的進修班。舉辦進修班的目的是界定戰略文化定義，並評估該理論可能為解釋國家戰略行動作出的貢獻。（安年科夫，2013:205）在此之後，致力於戰略文化研究的西方學者日益增多。針對戰略文化發揮作用基本條件的不同詮釋，西方戰略文化研究呈現出三個不同學派，即「決定論」、「工具論」和「選擇變量論」。

「決定論」以科林·格雷（Colin S. Gray）為代表。該學派認為，以冷戰期間美蘇兩國的戰略文化為研究案例，認為戰略文化是固定不變的，美蘇戰略文化的不同是美蘇兩國不同戰略選擇的決定性因素。其中，科林·格雷以美國戰略文化為例加以闡釋，認為「美國戰略文化是一種客觀存在，受到了美國的地緣政治、歷史、經濟和其他獨特因素的影響；它提供了對戰略觀念和國防政策進行辯論和抉擇的環境，有助於解釋為何美國的決策者會作出過去那些決策的原因。」（Gray, 1981:22）基於上述觀點，該學派進一步指出，戰略文化是影響國家戰略的決定性因素，其對於國家戰略的影響是相對穩定的。國家的歷史、文化因素（例如歷史經驗、政治文化）塑造了該國的戰略文化，繼而決定了該國的對外戰略。換而言之，戰略文化既能解釋一國過去和現在的戰略，也可以預測該國未來的戰略。（Gray, 1981:22）「決定論」試圖通過戰略文化研究構建一種可以解釋國家對外戰略的普適性理論，卻忽視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現實中一國對外戰略的走向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戰略文化對於一國對外戰略的影響應該是有條件的。

與「決定論」的觀點不同，以佈雷德利·克萊恩（Bradley Klein）為代表的「工具論」認為戰略文化與國家對外戰略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關聯。其中，佈雷德利·克萊恩認為，戰略文化是「國家決策者為了使他們實際施行的戰略被接受和消除潛在挑戰力量的工具，其目的是賦予其戰略選擇

以合法性、合理性。」(Klein, 1989:99-100)「工具論」著重分析了不同國家對外戰略相似的現實，由於國家行為是國家利益或者一個霸權集團的組織利益的反映，因此有可能國家使用不同的戰略文化語言，但是國家的實際戰略和行為在本質上是相似的。(Klein, 1988: 133-148)

以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為代表的「選擇變量論」汲取了上述兩個學派的研究成果與不足，並在此基礎上闡釋了國家對外戰略與戰略文化之間的關聯性，同時強調戰略文化發揮作用的基本條件是通過決策者的認知。該學派認為，無論是國際的體系因素還是國內的社會政治因素，都不可能對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結果產生直接的影響，而往往需要經過代表國家採取行動的領導人的認知、分析、選擇等過程才能影響國家的外交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江憶恩強調，「不同的戰略文化決定了不同國家對於戰爭與和平、衝突與合作等國際關係主題的認識，塑造了不同國家的身份認同和戰略偏好，繼而決定了國家之間不同的戰略選擇。」(Johnston, 1995:2)

「選擇變量論」強調，國家的戰略選擇是通過決策者的認知過程實現的，戰略文化在決策過程中發揮著干預性作用。戰略文化更多地是最近的實踐和經驗的產物，而不是來源於歷史。(秦亞青, 2006: 147-148)這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一國歷史、文化傳統對戰略文化的深遠影響。

與西方戰略文化研究相比，中國的戰略文化研究起步較晚。中國軍事科學院的李際均教授在《中國軍事科學》1997年第1期發表的《論戰略文化》一文，是中國學者首次正式提出「戰略文化」並對其詳加闡釋。李際均從宏觀層面將戰略文化視為一種系統化的戰略思想和戰略理論，認為「戰略文化是在一定的歷史和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戰略思想和戰略理論，並以這種思想和理論指導戰略行動和影響社會文化和思潮。」(李際均, 1997:8-9)

其他中國學者也對戰略文化做出了值得借鑒的定義。例如，李少軍將戰略文化定義為，「一個國家實施戰略的根本理念，是國家或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對利益與目標、朋友與敵人以及如何處理外部關係的習慣與傳統的總和。它根植於民族發展之中，決定一國大致的戰略偏好，並使國家具有相對穩定的戰略模式。」(李少軍, 2009:26)杭宇等人認為，戰略文化是指國家在確定和實現國家戰略目標時所表現出的相對穩定、持久的價值取向與行為模式，是制定現實戰略的潛在意識和歷史文化情結，是一個民族歷史經驗、民族特性、價值追求以及文化心理在戰略領域的集中反映。(杭宇、莊振華、李保軍, 2005:160)

與西方學者相比，中國學者普遍意識到戰略文化理論並非普適性理論，必須正視不同國家戰略文化的差異。比如，一個國家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會有什麼樣的戰略文化。有什麼樣的戰略文化，必然有與之相符合的國家行為。(李曉燕, 2009:87)大體而言，中國學者在西方戰略文化的研究基礎上，並針對西方戰略文化研究有待完善之處，側重研究不同國家歷史、文化傳統對於其戰略文化的影響，借助歷史加以分析、檢驗，進一步豐富、完善戰略文化的分析和研究模式。

21世紀初，隨著戰略文化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中國戰略地位的日益提升，隨著戰略文化研究的日益深入，中外學者日益關注國家歷史、文化傳統對於戰略文化的深遠影響，繼而試圖通過戰略文化探究一國歷史、文化傳統與對外戰略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性。因此，與中國戰略文化相關的議題逐漸成為中西方學者深度思考的焦點。

二、有關中國戰略文化的研究：交集與分歧

中外學者對於中國戰略文化研究的相互借鑒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是否與其戰略文化存在關聯？其二，中國的戰略文化是如何影響其對外戰略的？

首先，有關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是否與其戰略文化存在關聯的問題，李曉燕指出，文化不是必然地影響或者不影響戰略文化和國家行為，文化的影響程度取決於它被施動者內化的程度。根據文化的內化程度這個變量，就可以判斷一個國家在某一歷史時期的戰略文化表現與其文化傳統是否相符，其國家行為表現與戰略文化傳統是否一致。（李曉燕，2009:84, 91）

部分美國學者則認為，中國的戰略文化與其歷史、文化傳統並不存在必然關聯，故而無法解釋中國的對外戰略。其中，孔華潤（Warren I. Cohen）認為，中國只是表面上信奉孔孟之道，但中國戰略文化自古以來就是以現實主義和軍事進攻理念為特徵的，當代中國仍然是十分好戰和富有進攻性的。（Cohen, 1997: 103-106）

中國台灣學者石之瑜與喬納森·艾德曼（Jonathan R. Adelman）不贊同上述觀點。他們研究了自鴉片戰爭以來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歷史，發現中國的戰略選擇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兩千年來的傳統文化制約。中國的戰略文化崇尚以非暴力手段戰勝敵人，而中國發動的戰爭一般是以自衛為主，旨在迫使入侵的敵軍知難而退。中國的戰略文化傳統是難以用西方的理性戰略文化理念來解釋的。（曾瑞龍、鄭秀強，2002:4）馮惠雲對中國在三場大規模戰爭，即朝鮮戰爭（1950年-1953年）、中印戰爭（1962年）和中越戰爭（1979年）的對外決策詳加考察，其研究結論認為，中國領導人遵循儒家信仰和戰略決策準則及行為，因此顯示出防禦性而非進攻性的戰略文化。（Feng, 2002:2, 7）

其次，有關中國戰略文化與其對外戰略關聯性的研究，中外學者依然存在各自的見解。安德魯·斯科貝爾（Andrew Scobell）認為，「中國具有雙重的戰略文化：一是孔孟之道，反對衝突、重視防禦；二是現實主義政治，傾向於以軍事方式解決問題，富於進攻意識。這兩種戰略文化都在影響中國的戰略決策，並辯證地結合起來。」（Scobell, 2002:36）江憶恩則以中國的戰略文化作為個案研究，認為中國的戰略文化符合進攻性現實主義。江憶恩認為，當主導集團既具有某種類型的戰略文化偏好，又表現出與其一致的實際國家戰略選擇時，才能說明是此種戰略文化在影響其國家戰略選擇。（李曉燕，2006:35-36）江憶恩以明代歷史和《武經七書》作為實證研究依據，將中國的戰略文化作為研究個案，對其理論設計進行了經驗驗證，其結論是中國存在兩種不同的戰略文化。一種是象徵性或理想化的戰略文化，即與中國主導文化一致的孔孟儒家文化；另一種是中國實際的戰略文化，即與儒家文化完全相背的強現實政治文化。

對於江憶恩關於「戰略文化無法完全解釋中國戰略選擇」的論斷，部分中國學者認為，「任何戰略文化的內部都存在著各種分歧與對立，變動與發展，都存在著不同的亞文化傳統，這是引發戰略爭論的起因之一，也是戰略文化得以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之一。但是，內在的豐富多樣性並不會否定文化的主體傾向，也並不否定主導性戰略文化的存在。（宮玉振，2002:24-25）至於江憶恩在研究中選擇的《武經七書》，事實上並無能支持其論斷。對此，趙景芳認為，雖然江憶恩用軍事戰略文化來分析大戰略行為，不僅會得出錯誤的結論，而且由於文化的賦意過窄而考察不出國家戰略行為

的特色和國家間戰略文化的差異。(趙景芳, 2009:40) 江憶恩在此後發表的學術論文中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自己對中國戰略文化做出的論斷, 認為「目前仍缺乏足夠的論據來證明中國是一個試圖改變現狀的修正主義國家。」(Johnston, 2003:48) 可以說, 「僅以明代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為例進行實證分析並得出相關結論, 確有偏頗之嫌」。不但是中國, 包括很多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國家, 其歷史上各時期的戰略文化並非都是同質的。(白雲真、李開盛, 2009:258)

三、戰略文化與國家戰略的關係

戰略研究的科學性需要通過歷史的檢驗, 戰略文化研究也不例外。戰略文化研究的實際價值, 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戰略文化與國家戰略的關係。具體而言, 戰略文化與國家戰略的關係, 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 戰略文化脫胎於特定的地緣環境並催生相應的國家戰略

地理是戰略之母。(Sloan and Gray, 1999:3) 依據不同的地理結構, 國家的地緣環境可以劃分為三類, 即海洋型、內陸型與陸海復合型國家。基於不同的地緣環境, 形成了不同的戰略文化, 並催生具有相應特徵的國家戰略。

1. 海洋型國家

海洋型國家的領土由島嶼組成, 其戰略文化在對外戰略中的體現集中於對海權的關注。具體而言, 當海洋型國家有實力維持海權時, 傾向於對周邊國家進行戰略制衡; 當海洋型國家無力維持海權時, 則傾向於實施「與強者為伍」的聯盟戰略。

以英國為例。英國位於亞歐大陸的邊緣, 憑借大西洋、英吉利海峽的天然屏障, 抵制來自歐洲大陸的戰略威脅。從 15 世紀末至 19 世紀末, 隨著英國海權的增強, 長期對歐洲大陸實施「均勢戰略」*, 有效地維持歐洲大國之間的實力平衡, 防止任何一個歐洲大國構建霸權並威脅英國的利益。直至 19 世紀末, 英國的海權日趨衰落, 其均勢戰略也隨之黯淡。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英美同盟取代了均勢戰略在英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 時至今日依然是英國對外戰略的基石之一。

英國的戰略文化傳統對其國家戰略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英國歷來注重以有限的國力維持英國的大國地位, 特別擅長利用結盟、有限干涉和均勢外交等制度安排為英國的利益服務。縱觀歷史, 為有效消除對英國海洋霸權和本土安全的威脅, 同時減少防務開支和資源消耗, 英國長期推行歐陸均勢政策, 以實現歐陸大國相互牽制, 確保歐洲力量均衡的目的。(宋德星、李慶功, 2016:125)

* 国家或集团间为保持力量平衡, 在军备和国防建设上采取的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制约的军事战略。

2. 內陸型國家

內陸型國家地處內陸，其戰略文化基本傾向與周邊國家共享地緣空間和戰略資源。以瑞士為例。瑞士位於西歐中心，四周被德、法、意、奧等大国包围，是歐洲的戰略要衝。但是，瑞士約三分之二的面積為山區，缺乏耕地與礦產資源。考慮到自身和平、安定的戰略需要，瑞士在歐洲三十年戰爭（1618年-1648年）^{*}中就開始奉行中立政策。至今，瑞士繼續奉行永久中立的對外戰略。永久中立的對外戰略不僅維護了瑞士國內安定，更有力地促進了本國經濟的發展。

無獨有偶，另一個內陸國土庫曼斯坦於1995年12月12日，由第五十屆聯大一致通過決議，正式成為永久中立國。土庫曼斯坦位於中亞西南部，西臨世界上最大的湖泊裡海，陸上與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等四國相鄰。再以蒙古國為例。該國位於俄羅斯和中國之間。主要為高原，西部是阿爾泰山脈和杭愛山脈，南部是戈壁沙漠。（艾薩克斯，2002:795）2015年9月29日，蒙古國在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上宣佈，將實行永久中立政策，希望成為永久中立國，並呼籲國際社會各方予以認可和支持。2016年初，《蒙古國永久中立法》正式出台，標誌著蒙古國永久中立政策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確定實施。（張凱，2016:55-56）永久中立的對外戰略，不僅有助於蒙古國平衡與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也有利於其發展與美國、日本、德國以及歐盟、北約的關係。

3. 陸海復合型國家

陸海復合型國家的地緣環境以陸海兼備為主要特徵。陸海復合型國家出於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將有限的戰略資源投入到陸海兩個方面。通常，此類國家較其他類型的國家更為重視戰略資源的投入，強調國家地理邊界與戰略邊界的一致性。

以中國為例。從地緣環境來看，中國三面深入亞洲大陸腹地，對內有較大的回旋空間，對外則是一個相對封閉的次大陸。在這種地理環境下，維護內部的統一佔用了中國歷代王朝大部分的戰略資源。中國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戰爭是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和政治集團為謀求統一而進行的戰爭。在1840年以前，中國是東亞乃至全球最為強大的國家之一，卻並未將武力擴張作為基本國策。儘管中國歷史上曾在漢朝、唐朝、和清朝對外用兵，但是大多數出於積極防禦的戰略目的，或是抵禦周邊國家或民族的侵襲，或是周邊國家發生動亂影響到中國的安全所致。不僅如此，每次用兵的戰略重點始終是確保中國疆域的安全，在取得預期戰果後便適可而止。

* 三十年戰爭，神聖羅馬帝國內競爭的各王朝和宗教間的利益衝突導致的一場重大的歐洲戰爭。起因於波希米亞的新教徒針對布拉格帝國政府的反改革政策而爆發的起義。儘管1620年王朝軍隊打敗了波希米亞人，但起義繼續蔓延，並以曼斯菲爾德（Mansfeld）率領的德意志新教徒為主力軍，同時得到英國、荷蘭及丹麥的零星援助。隨著《歸還教戶敕令》（1629）的實施，斐迪南二世在天主教聯盟統帥華倫斯坦（Wallenstein）及蒂利（Tilly）率領的軍隊的援助下，驅逐了許多德意志新教徒。1630年瑞典在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 II Adolphus）率領下進行武裝干預，德意志新教徒獲救。1635年，法國想控制西班牙及羅馬帝國，也加入這場戰爭。1648年，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Westphalia, the Peace of），戰爭結束。參見[英]艾倫·艾薩克斯主編，郭建中、江昭明、毛華奮等譯。[M]. 麥克米倫百科全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1158。

筆者認為，可以將中國的戰略文化概括為「尚合慎戰」四個字。

「尚和」究其實質，就是「通過中國人民的艱苦奮鬥和改革創新，通過同世界各國長期友好相處、平等互利合作，讓中國人民過上更好的日子，並為全人類發展進步做出應有貢獻。這已經上升為中國的國家意志，轉化為國家發展規劃和大政方針，落實在中國發展進程的廣泛實踐中」。（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

「慎戰」即奉行防禦型的國防政策。具體表現為：

首先，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與任何國家結成針對第三方的軍事同盟。其次，不尋求領土擴張，即便是在與鄰國存在領土爭議的問題上，也不遺餘力尋求政治途徑的解決方式。第三，不從事以對外擴張為目的的軍備活動。（戚鹿寧、張權，2016:99）

中國秉承「尚合慎戰」的戰略文化，將重心放在「內部整合」而非「對外擴張」，其實質在於將有限的國力用於實現最為重要的國家利益，不到萬不得已絕不刀兵相向。換而言之，中國的和平發展絕非權宜之計，而是遵循其戰略文化傳統的必然選擇。

（二）戰略文化通過決策者來影響國家戰略

處於相似地緣環境的國家未必會實施相似的對外戰略。這主要是因為，決策者在戰略文化的影響下，對具體問題加以分析並制定相應的對外戰略。可以說，對外戰略被決策者賦予相應的戰略文化烙印，決策者對戰略文化的認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對外戰略的走向。比如，「戰略文化可以為決策者提供程式化分析與解決問題的有效思路和對策，從而簡化戰略認知過程，提高戰略決策效率。而且，遵循戰略文化傳統解決問題，還可以提高對外行動的合法性，容易獲得民眾的支持與認可」。（李效東，2015:566）

本文將中國和美國這兩大陸海復合型國家做一比較，嘗試分析決策者對戰略文化的認知對其對外戰略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尚合慎戰」的戰略文化傳統受到了新思想和新形勢的影響，並未發生實質性的改變。中國決策者有意識地避免走軍事崛起的道路。1955年，毛澤東在與印尼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的會談中做出了「和平為上」的論斷。鄧小平在堅持永不稱霸的政策基軸下，準確把握當今世界的潮流，明確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問題。基於鄧小平的國際戰略思想，2005年11月9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倫敦發表演講時闡述了中國的和平發展觀，指出中國選擇和堅持的是和平發展道路，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既是通過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是通過自己的發展來促進世界和平，永遠做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堅定力量。（胡錦濤，2005）

可以說，中國戰略文化的和平本質決定了中國發展道路的選擇方式，同時也表明中國和平發展是對中國戰略文化傳統的繼承與昇華。在實施對外戰略的過程中，中國始終不謀求霸權，恪守領土邊界與戰略邊界的一致性。時至今日，中國依然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正如習近平主席在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 70 週年大會上做重要講話時所說，「前進徵程上，我們要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繼續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2019）

再以美國為例。美國決策者維護的是美國在全球的戰略優勢。對於「東西有大洋，南北無強鄰」的美國而言，其戰略文化是優越感與危機感的混合體。

所謂優越感，源自於以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新教徒文化和白人文化為核心的美國文化及其「天賦使命」觀。在這種優越感的影響下，美國決策者始終認為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能夠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總是把其他國家是否接受自己的文化價值作為衡量該國文明進步與否的尺度。

所謂危機感，主要指美國決策者擔心其海陸方面的地緣優勢可能會轉變為劣勢，具體而言是防範來自於太平洋或大西洋的海權挑戰，以及潛在的核武器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戰略文化影響下，美國的對外戰略呈現出明顯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傾向，即保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防止任何國家威脅美國的陸權或海權，同時靈活實施各種戰略手段與策略以配合上述目標的實現。

可以說，美國的戰略文化有需要「塑造敵人」的傳統。（朱鋒，2019）

這種美國需要敵人的戰略文化，就是創造敵人然後戰勝敵人，對此不要有任何的幻想。這是美國的 DNA，這種戰略思維貫穿美國整個歷史，從建國之初的孤立主義，到後面「西進運動」，羽翼逐步豐滿後提出「門羅主義」，再到後來的全球主義，無不如此。（王義桅，2019）

冷戰結束至今，雖然美國的全球戰略一直處於調整之中，均是為了確保其核心戰略目標的實現。例如，美國提出的「單邊主義」對外戰略，其實質並非放棄多邊主義，而是致力於構建能夠充分反映美國利益與意願的國際聯盟，或者構建以美國利益為基礎的多邊主義；美國對華提出的「利益攸關方」與「戰略再保障」戰略，則是著眼於推動中國盡可能地分擔美國的國際責任。此類策略性調整，並不意味著美國對外戰略出現了實質性的轉變。

（三）戰略文化能夠適應戰略形勢的變化與發展

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是螺旋上升式的。國家是一個具有學習和反思能力的行為主體，能夠面對新的戰略形勢逐步積累相應的經驗。相應的，這就要求戰略文化必需不斷適應戰略形勢的變化與發展。

筆者認為，戰略文化的適應方式可以分為兩種。其一，主動適應，是指在沒有或者基本沒有外來干預和影響的情況下，由於戰略文化模式內在的超越性以及戰略文化內在的自我完善的合理性要求。戰略文化的主動適應表現為國家對戰略文化模式進行質疑和批判，從政策的成敗中自我修正，以便適應新的戰略形勢。其二，被動適應，是指在特定的歷史、政治或經濟條件下，當前的戰略文化不再能滿足國家的基本安全需求，或者慘重的損失使國家上下產生了普遍的失敗感和羞辱感，那麼整個社會就會要求重新審視原有戰略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並催生戰略文化中新因素的發展。被動適應戰略環境，很可能導致一國的戰略文化發生重大逆轉。相比之下，主動適應地緣環境的變化，更有利於戰略文化的長期發展。

結語

戰略文化研究的積極意義在於，不會因為一國實力的強大，就得出其必然走向擴張的結論，而會透過一國戰略文化對其國家戰略做出更為理性的判斷。隨著戰略文化研究的深入，從基礎理論到經驗驗證都有很多問題有待提出和探討。例如，決策者的預期與偏見會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國家戰略？非國家行為體是否具有戰略文化？如果非國家行為體具有戰略文化，那麼其戰略文化與國家行為體的戰略文化有何異同之處？對於上述議題，均有待於進一步的探究。

參考文獻

- [俄] 安年科夫. 國際關係中的軍事力量: 俄羅斯專家獨特視角解讀和預測新世紀全球軍事力量形勢與國際關係走向. [M].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3.
- [英] 艾倫·艾薩克斯主編. 郭建中、江昭明、毛華奮等譯. 麥克米倫百科全書.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 王義桅. 認清中美貿易戰實質. [N]. 新華日報, 2019-09-17.
- 白雲真、李開盛. 國際關係理論流派概論.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 朱鋒. 中美當然可以走出「歷史窠臼」. [N]. 環球時報, 2019-01-02.
- 李少軍. 中國的戰略文化. [J]. 當代亞太. 2009, (1): 26-28+7.
- 李效東. 現代國際安全理論精要. [M]. 北京: 軍事科學出版社, 2015.
- 李際均. 論戰略文化. [J]. 中國軍事科學. 1997, (1): 8-9.
- 李曉燕. 文化·戰略文化·國家行為. [J]. 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 2009, (4): 83-93.
- 李曉燕. 戰略文化與國家行為——江憶恩戰略文化理論述評. [J]. 世界經濟與政治, 2006, (7): 33-39+5.
- 佚名. 堅持和平發展道路——三論學習貫徹習主席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 [N]. 解放軍報, 2019-10-04.
- 宋德星、李慶功. 世界主要國家安全政策. [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6.
- 杭宇、莊振華、李保軍. 當代中國戰略文化追求的價值重心. [J]. 軍事歷史研究. 2005, (4): 160-163.
- 胡錦濤. 在倫敦金融城市市長薩沃里舉行的歡迎晚宴上的講話. [N]. 人民日報, 2005-11-11.
- 秦亞青主編. 文化與國際社會: 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研究. [M]. 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6年.
- 宮玉振. 中國戰略文化解析. [M]. 北京: 軍事科學出版社, 2002.
- 戚鹿寧、張權. 中國戰略文化中的「慎戰」思想探析. [J]. 改革與開放, 2016, (15): 97-99.
-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 [Online].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1/Document/1000032/1000032.htm>

- 張凱. 蒙古國永久中立政策地緣因素分析. [J]. 公共外交季刊, 2016, (2):55-60+127.
- 曾瑞龍、鄭秀強. 20世紀90年代的戰略文化理論：一個拓展中的學術領域. [J].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2002, (7):1-12.
- 趙景芳. 美國戰略文化研究. [M]. 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9年.
-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e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ic in Chinese History.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7, no. 4, Spring 2003: 5-56.
- Andrew Seobell. China and Strategic Culture. [M]. Washington: Th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2.
- Bradley Klein. “Hegemony and Strategic Culture: American Power Projection and Alliance Defense Politics”.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8(14): 133-148.
- Bradley S. Klein. “The Textual Strategies of the Military: Or Have You Read Any Good Defense Manual Lately?”. [C]. in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World Politics,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89. 97-112.
- Colin Gray. “National Style in Strategy: An American Example”.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1, 6(2): 21-47.
- Geoffrey Sloan and Colin S. Gray. “Why Geopolitics?” [C]. in Colin S. Gray and Geoffrey Sloan, eds.,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London: Frank Cass, 1999. 1-11.
- Huiyun Fe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 [M]. Santa Monica: Rand, 1977.
- Warren I. Cohen. “China’s Strategic Culture”. [J]. Atlantic Monthly. 1997, 279(3):107-109.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CHEN KAI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Ph. 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iamen University, China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ddress (地址): Room 310-3, Nan' an Building, Xiamen University, No.422, South Siming Road, Siming District, Xiamen, China, 361005

